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第一辑）普及版

总主编 雷恩海

《说苑》



品读



曾贤兆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  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

国学经典书系（第一辑）普及版

总主编 雷恩海  
副主编 陈晓强 曾贤兆  
编委 蒋凡 吴兆路 周绚隆 方铭 马永强  
雷恩海 陈文江 崔明 陈晓强 曾贤兆

《  
说  
苑  
》  
品读

曾贤兆 著



兰州大学出版社  
LANZHOU UNIVERSITY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《说苑》品读 / 曾贤兆著. — 兰州 : 兰州大学出版社, 2016. 11

(国学经典书系 / 雷恩海总主编)

ISBN 978-7-311-05038-2

I. ①说… II. ①曾… III. ①笔记—中国—西汉时代—选集 IV. ①K234.106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98304号

责任编辑 张 仁

封面设计 郇 海

---

书 名 《说苑》品读

作 者 曾贤兆 著

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(地址: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)

电 话 0931-8912613(总编办公室) 0931-8617156(营销中心)

0931-8914298(读者服务部)

网 址 <http://press.lzu.edu.cn>

电子信箱 [press@lzu.edu.cn](mailto:press@lzu.edu.cn)

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mm×1020 mm 1/16

印 张 14.75

字 数 205千

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

印 次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311-05038-2

定 价 30.00元

---

(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、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)



# 序



雷恩海

---

“国学”是一个历史名词,出现于清末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,西方在完成其政治变革与工业革命之后,开始有计划地东进,东方世界成为西方开发的巨大市场,并且带着强烈的殖民性。欧风美雨东渐,以坚船利炮裹挟着强势的社会价值体系和思潮,先后对中国发动了五次侵略战争,而且曾是朝贡体系内的日本,也以强势侵袭。值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,中国学人惊惧、疑虑、拒斥、反思,有亡国灭种之忧患,进而提出要对中国的学术进行全面的研究。最有代表性的是张之洞,在《劝学篇》中提出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强调在保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,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与中国政治、文化不冲突的外来成分。实际上,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,西方先于东方实行近代化,当东西方遭遇之时,必然会带来冲突。这一现象,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“中西之交,古今之异”。“国学”的概念,就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应运而生。国学,即中国传统学术的简称。时任清华研究院主任的吴宓教授认为,“所谓国学者,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”(《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》)。蔡尚思说:“国是一国,学是学术,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。其在中国,就叫做中国的学术。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,那就无所不包了;既然无所不包,也就无所偏畸了。”并且说“中国的固有文化,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”(《中国学术大纲》)。应对西方文化之强势进入而产生的“国学”概念,既要保全中国故有文



化学术,又要汲取西方学术文化之精髓,承载着统合中西文化的使命。1902年,黄遵宪《致梁启超书》赞同梁氏“养成国民,当以保国粹为主义,当取旧学磨洗而光大之”,并且说“今且大开门户,容纳新学。俟新学盛行,以中国固有之学,互相比较,互相竞争,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,真道理乃益明,届时而发挥之。彼新学者或弃或取,或招或距,或调和,或并行,固在我不在人也”,主张融会中西学术,开启国学之新局面。1911年,国学大师王国维为《国学丛刊》作序,明确指出:“今之言学者,有新旧之争,有中西之争,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。余正告天下曰:学无新旧也,无中西也,无有用、无用也。何以言学无中西也?世界学问,不出科学、史学、文学。故中国之学,西国类皆有之,西国之学,我国亦类皆有之,所异者,广狭疏密耳……余谓中西二学,盛则俱盛,衰则俱衰,风气既开,互相推助。且居今日之世,讲今日之学,未有西学不兴,而中学能兴者;亦未有中学不兴,而西学能兴者。”因而,“国学”就是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研究方法,对中国学术加以系统的整理和总结,是中国现代性发展的必然,也是传统学术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寻找自身位置的一种努力。当时尚有国粹、国故之称。国粹,似乎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;而国故则指本国文献(过去的文献),但国故只能代表研究的对象,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。相比较而言,还是“国学”一词,比较全面公允一些。

二十世纪九十年代,兴起“国学”热,积极响应者有之,批评者有之。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,“国学”持续受到许多人的欢迎,人们对国学的认识也日趋理性。国学热之兴起,乃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恢复。应该清醒地认识到,虽然我们的国力增强了,但到今天为止,我们仍然处于这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,无论科技,还是文化等,西方仍然处于领先地位,世界仍然处于西方文化主导下的格局之中。那么,如何在科技和文化两个层面上成为世界强国,如何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、精神文明体系,确立文化自信,就是我们需要考虑的。显然,重新审视传统,阅读传统,就成为一种必然。国学热,乃民间自发,而最后由在上者所认识而进一步倡导。习近平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指出,“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

的根本,如果丢掉了,就割断了精神命脉”,极为精辟地指出了国学的根本内涵和意义。

研究国学,并非抒发思古之幽情,更不是排斥来自西方的新思想。国学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积淀,承载着传统文化,而传统是演进的而非僵化的,是历史与现在之间的价值纽带。国学不但是历史的积淀,而且也是面对现在而指向未来的。因此,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国学是不应该被忽略甚至于忘记的。忽略甚或忘记了传统,也就失去了当下的根基,无法谋划现实的生存,因而也无法明确未来的走向。譬如,一个人今天早晨起来后,他失忆了,忘记了昨天及以前的事情,那么,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我,不知道今天该干什么,无法安顿自己,即没有办法给自己一个定位。他忘记了自己的过去,站在大街上,茫茫然不知所从,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的,是去市政府上班,还是进入学校教书,是去清扫马路,还是到工厂做工。不知道今天做什么,就无法安顿心灵,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存状态,那么他将如何生存呢?忘记过去,就是割裂其历史;不知道今天,那么,就无法知道明天。事实上,忘记了昨天,就意味着今天、明天都处于一个无所举措的状态。一个民族也是如此,忘记其传统,割断历史,就没有现在的发展和未来走向;而继承、发扬其优秀传统,以开阔的视野,吸收新的文化素养,吐故纳新,继往开来,它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国学,从广泛意义上来说,就是华夏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。学习国学,即在于传承文化,以一种广阔的视野和开放的心态,继往开来。“所谓文化,就是一个民族在悠长的历史中,在一种制度下形成的、渗透到民族的血脉中的集体记忆,一种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和行为模式。”那种以学术为生命的不懈追求,正是对优秀文化的传承,是华夏民族的凝聚力所在。文化割弃了传统,是贫瘠的文化,最终也就导致其衰败。没有文化的民族,即没有其灵魂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冯友兰〈中国哲学史〉下册审查报告》中提出民族文化本位的问题:“是以佛教学说,能于吾国思想史上,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,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。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,若玄奘唯识之学,虽震动一时之人心,而卒归于消沉歇绝……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,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



东欧之思想,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,在吾国思想史上,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,且亦终归于歇绝者。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,有所创获者,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,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,乃道教之真精神,新儒家之旧途径,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

文化是民族的根性所在,马克思说:“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,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,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,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、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。”传承文化,发扬优秀传统文化,以开阔的视野、恢弘的气度,与世界上诸多文化交流,使得华夏文明得以延续,继往开来,开拓创造华夏文化的新境界。冯友兰先生以哲学家的睿智,提出“阐旧邦以辅新命,极高明而道中庸”,乃是对华夏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的高度概括,也是对华夏文化吸收外来文化,融入世界潮流的期望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——希望华夏民族能够奋发图强,成为一个拥有优秀而悠远的文化传统、具有开阔视野和创新活力的现代化国家。没有继承,就没有创新,关键乃守正而出新。

## 二

一般来说,国学大致被理解为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,其内容应包括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之学,融合儒释道诸家,而又以儒学为主体。事实上,国学乃一种载体,传承的精神品性、知识技能,可以说是经过时间淘汰而流传下来的精华。国学需要借鉴西学的研究方法,汲取其学术素养,全面整理、研究,融会贯通,传扬其优秀文化品质。一个人的成长,要有自身资源、家庭资源、社会资源,还要有历史资源。而这历史资源就是国学所承载的主要内容。

读书不仅仅是获取信息,储备知识。这种记诵之学,在严格意义上来讲,不是学习的根本目的。就是说,读书乃为求知,在于培养具有思想性的人才,借助作者的思维过程、思维方式,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,提高自身的水平与



能力。知识之获得,不可能凭空而来,必须借助于某种媒介,通过一种介质的训练、培养,而使我们获得知识,化为能力,练人才性,提升思维能力。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,正是读书学习的关键。学习前代的文化典籍,正是训练思维、获得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。爬罗剔抉,提要钩玄,乃逻辑思维的归纳与演绎之训练。读一本书,如果仅仅停留在了解一个故事、事件的层面,显然是浅层次的;而有意识地、主动地借助于他人的思维方式、思维过程,训练自己的思维,培养自己观察问题、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无疑是深入的读解,达到了读书求知之目的。而阅读理论性的书籍,其精密的逻辑思维、推理论证、辨疑析难的能力,显然对训练思维、培养能力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》说:“积学以储宝,酌理以富才,研阅以穷照,驯致以绎辞。”源远流长、充实丰富、瑰丽多彩的国学经典,积淀为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品。阅读、研究,正可以训练思维,培养能力。

然而,长期以来,我们忽略了对国学的阅读与传承,甚至于忽略了阅读本身。所谓“国学热”“文化热”,事实上并没有“热”起来,往往呈现为喧嚣的“争鸣”,甚至是浮躁的状态,尚未切实地进入阅读本身。在热闹、喧嚣的“文化热”氛围之中,如何自我定位,如何寻求阅读的对象、内容,需要做出“冷静”的判断。说到底,阅读是一种个人行为,是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、知识储备,进行有针对性的阅读,以进德修业,提高自身的文化品性和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的能力。这就需要不盲从,不跟风,有自己的定见,根据自己的需要,或者研究的需要,有针对性地阅读,这样才会有比较快的提高。

所谓阅读,就是指对一部书,或者一篇文章,从头到尾地读下来。清人冯班在《钝吟杂录》中说:“多读书则胸次自高,出语皆与古人相应,一也;博识多知,文章有根据,二也;所见既多,自知得失,下笔知取舍,三也。”这样读书的好处,首先是专注。思想集中才有兴趣。无论任何科目,无论这科目是跟你的兴趣相差多远,只要你能对之集中思想,兴趣即盎然而生。第二个好处是系统深入地理解。因为能够专注地读完一篇文章、一部书,对作者的思想与意图以及文笔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。二十世纪的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说,他



读书是拿到一本书,从头读到尾,即使这部书不太好,也不中辍。因为从头读到尾,就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,好在何处,不好又在何处,斟酌损益,当有所得。第三个好处,思维空间很大,触类旁通。一篇文章或一部书,无论是记叙类的,或者是理论类的,都有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,会围绕着事件或问题,全面地展开,这样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思考的场域,从而调动自己的思维,开拓思维能力,进而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和理解水平。第四个好处,就是训练思维,提高能力(阅读能力,理解能力,更是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处理问题的能力)。就是说,阅读不仅仅是为了获取信息。海量信息有时候是无用的信息,反而淹没了读者,导致他们不会判断、分析,成为散乱信息的收集者,成为“两脚书橱”。第五个好处,就是加强知识的系统性。任何知识都有其系统性。清代著名作家、画家郑板桥用盖房子的道理谈画竹子的体会:“昔萧相国何造未央宫,先立东阙、北阙、前殿、武库、太仓,然后以别殿、内殿、寝殿、宫室、左右廊庑、东西永巷经纬之,便尔千门万户。总是先立其大,则其小者易易耳。”先立其大,即要有大判断,对研究对象要“目有全牛”,而不是盲人摸象。分清何者为主纲,何者为末节。主纲确立,而后细节才能发挥作用,有益于支撑和加强主纲,两者相得益彰,发挥更大的效益。知识是系统的,读者把握住一端,由此深入下去,既是深度的钻研,也是广度的拓展。这样读书,就能够触类旁通,举一反三,摆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镕裁》说:“首尾圆合,条贯统序。若术不素定,而委心逐辞,异端丛至,骈赘必多。”知识系统和研究的领域逐渐扩大,对问题的认识,也就能够识其大体,有大判断。

### 三

作为一个中国人,应该对我们的文化传统有所了解,既要知其精粹思想,也要了解其陈腐的观念;要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还应有虚心诚实的心态,以了解之同情对文化传统继承与发扬。文化的发展,有累积性,也有否定性,因而才能创造性地继承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,革故鼎新,既要延续我们的文化,



又要创造新的文化传统。

与现代学科分类不太相同,国学包括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词章之学、经世之学,涵盖传统四部分类的经、史、子、集,内容丰富,贡献巨大;既有知识性的体系,又颇重视经世之学,强调“载道”,传达一种精神品性。事实上,学术研究、文化传扬,实乃“网罗天下放佚旧闻,稽其成败兴废之理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(司马迁)。

因此,我们编撰这套“国学经典书系”,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,也强调“载道”及人格之养成。目的在于让读者了解,什么是中国文化。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基本的、核心的价值观以及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。国学经典对人的道德品性形成,有其重要意义。格物致知,正心诚意,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,由内而外,由个体而推广及于整体、国家以至于天下;反过来,又由天下情怀而对个体的道德品性做观照,提高个体的境界。而且,国学经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,乐群、敬业、爱国、独立思考,既注意上下有序,又重视人的自觉与平等。乐和同,礼别异。在追求个性自由、重视个人之同时,也不忽略集体性,将个体与家国利益相统一;既要有灵活性,能够跨界创造,又要有持之以恒的毅力,坚守岗位。国学经典有助于培养读者的思维能力、思维方式,提高基本文化素养。从狭义来说,知识是技能性的,而文化则是一种能力,一种判断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力,也是一种生存的境界。二十世纪的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在《新原人》中指出人的精神境界可分为四种:自然境界,功利境界,道德境界,天地境界。天地境界,不是直接的经世致用,而是融入了一种可以包容天地的胸襟,这是道德、人格的升华;升华到与万物为一,超越其他三个境界,而有了物我一体、万物皆备于我的相通,这时精神最为自由,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。这种对学术的痴迷,纯粹出于兴趣的探索精神,很有一些中国古人所说的“谋道不谋身”的意思,对形而上的“道”的追求,自然会获得“谋身”的结果。而原创性的科学发明和理论创造,所依赖的正是这种“谋道”的精神。国学经典是最佳的媒介,读书明理,获得能力,而非仅仅是“两脚书橱”的知识储备。世界文明古国,只有中国是自古

延续至今。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传承创新，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使命。中国传统的辩证思维、坚韧不拔的毅力、文化的包容品性，都是我们走向未来、开创未来的思想文化资源。

“国学经典书系”以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分类法编选篇目，针对不同的读者群，分为初级版和普及版，由原文、题解、注释、品读、扩展阅读等模块构成。原文，选择佳好的版本，如精校本、注释本，选编原文，力求保持原典的本来面目，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、佳好的文本，使读者能够对原典有一个全面、整体的把握。题解，乃是对所选的篇章、片段，做出一些必要的交代和说明，以便明了上下文之间的内容及关系，有助于读解文本。注释，力求简洁，一般只注字、词，不注句子，方便阅读和理解。品读，乃是对所选原文的品评、欣赏、理解，着重从故事性、趣味性上，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，讲述其丰富生动的内涵，“理”寓于“事”中，“事”因“理”而深刻、生动。品读也尽可能地揭示思想的力量、文章的内涵以及思维的逻辑，期望有助于阅读能力的提升。扩展阅读，则是选择与原文相关（相似或相反、不同视阈的记载等）的内容，或者见出所选的文字、故事在后世的影响或衍生，启发联想，拓展知识，训练思维。而品读和扩展阅读，事实上是将阅读与思考结合起来，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”。弗朗西斯·培根说：“读书使人成熟，讨论使人丰富，写作使人严谨。”读、思、写三位一体，写是在多读深思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的表演。写出来，才是对思维的进一步完善；读、思、写相结合，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阅读水平，训练思维，进而使人可能具有天地境界。

这套书系的编撰，力求内容丰富、生动，富有启发性，引起读者对国学原典阅读的兴趣，丰富其国学素养，培养读书的境界。近代大学者王闿运说：张之洞是看书人，曾国藩是读书人，“所谓读书人，能通经致用；看书人，则书是书，人是人，了不相涉，即所谓记问之学、博而寡要者也”（刘成禺《世载堂杂忆》）。就是说，读书人要能掌握知识并应用于实践之中，知行合一。期望我们都做个有思想、有创造力的“读书人”。

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。读书学习，就在于确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

基。古人云：“立身以力学为先，力学以读书为本。”所谓“立身”，实乃关乎其人之思想境界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思想的人，有思想的生命才是完整的。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，则有什么样的“立身”原则、行为方式，也因而确定了其人日后的成就。思想清明、品格伟大之人，介然有守而不因循守旧，也不随波逐流。读书人知行合一，多读书，可以怡情悦性、涵养性情，可以洞明事理、培育思想，从此打开一个智慧的世界。精骛八极，心游万仞，观古今于须臾，抚四海于一瞬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
2017年11月10日

春融堂

序



009



## 前 言



刘向(前79—前6年),本名更生,48岁时改名向,字子政,沛(今江苏沛县)人,著名的经学家、目录学家、文学家,与其子刘歆同为中国文化史上杰出的文化大师。他是皇室宗亲,是汉高祖刘邦的同母弟楚元王刘交的玄孙。这一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的家族与西汉政治的紧密联系。其祖父刘辟疆,为汉武帝所重,曾随二千石大臣议论,为宗室子弟之冠,清静寡欲,常以书自娱,不肯出仕。其父刘德,年少时多次议政,三十岁时曾被武帝召见于甘泉宫,被誉为“千里驹”。前87年前后,武帝临崩而新立幼储,是为汉昭帝。为避免女主乱国,武帝将年轻的妃子、昭帝之母赵婕妤罚遣而致其忧死。又在诸臣中选择了托孤大臣,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,金日磾为车骑将军,桑弘羊为御史大夫,与丞相田千秋俱受遗诏。昭帝即位后,政事一决于霍光,他起用了年已八十的刘辟疆出任管理皇族事务的主官宗正,数月后便卒于任上。不久,刘德袭父荫迁太中大夫,前80年,出任宗正。宗正是管理皇族事务的主官,也就是皇族的族长,由有声望的皇室子弟出任,尤其在汉初分封的诸侯王动辄叛乱的情况下,这一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第二年,其子出生,刘德为他赐名“更生”,意味着身逢盛世、幸遇明君。另外,“更生”一词,还有着受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,据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记载,刘德“修黄老术,有智略”。《庄子·达



生》亦有言：“无累则正平，正平则与彼更生”，可见寄寓了美好的政治理想。

前74年，昭帝驾崩，宣帝即位。五年之后，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薨，宣帝开始亲政。这一年，11岁的刘更生凭借父亲的地位荫任掾郎，属皇帝的近侍郎官系统。前60年，二十岁的刘更生行过冠礼后，因其卓越的品行而擢为谏大夫。不久，又因文辞卓越而被选为名儒俊才，待诏金马门。作为皇帝的近侍，此后的四年之中，刘更生与众多政治精英和硕学通儒一道处理政务、讲经论学、商量百家、吟诗作赋，得到同僚的支持和皇帝的宠幸。然而，好景难继，宣帝颇好神仙，刘更生因献秘方不验而获罪，虽经父兄极力营救而免于死，出狱之日，其父刘德又离他而去。由此，刘更生经历了他的人生第一次重大困厄，告别了在金马门意气风发的生活。待诏金马门的四年当中，锻炼了刘向敏锐的政治眼光，他参与了广博的思想学术活动，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歌赋，这些得天独厚的经历为其日后成为一代通儒，奠定了重要的基础。

约前55年，因为刘更生的博学与通达，又为他的人生赢得了新的机遇。宣帝将《谷梁春秋》立为学官，征召刘更生做了助教。前51年，汉廷召开由硕彦鸿儒参加的石渠阁会议，讨论五经异同，由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，宣帝亲自评判。刘更生参与其中，并于辩论中获胜，被拜为郎中给事黄门，不久迁散骑、谏大夫、给事中。前49年冬天，宣帝驾崩。宣帝朝可谓刘向一生的黄金时期，待诏金马门和参与石渠阁会议也是他最重要的人生经历。但宣帝朝也开启了宦官和外戚专权的局面，为西汉灭亡种下了祸根。前48年，元帝即位，太子太傅萧望之辅政，刘更生出任宗正，位列九卿。弘恭、石显等宦官勾结奸佞，形成对立的势力。为除宦官势力，萧望之、刘更生、周堪等与宦官集团两轮较量皆遭失败。前47年，萧望之下狱后被迫自杀，刘更生被免为庶人，放废十余年。在此期间主要著书明志，也曾上书言事，而不见用，于是仿屈原《九歌》作《九叹》以自悼。前33年夏天，元帝驾崩，成帝即位。元帝朝的政治是以萧望之、周堪、刘更生等为代表的儒臣与宦官集团激烈斗争的时期，儒臣集团的失败，一方面固然是宦官集团的强大和元帝的昏聩所致，但很大的程度上，也与萧望之等缺乏政治智慧不无关系。刘更生除了在他的政论文章中有所



阐述之外,在《说苑》《新序》当中,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的方法,以娓娓道来的故事形式,表达了出来。

成帝是刘更生侍奉的第三位,也是最后一位君主,史载其性格宽厚尔雅,好文辞,他即位以后,将宦官石显以升迁的方式迫使其离开了权力中枢,弘恭早亡,于是这一宦官集团被打压了下去。作为与宦官集团做过尖锐斗争的刘更生此时也得到了新的任用,被召拜为中郎,数次奏事后,迁为光禄大夫。于是,重新获得政治生命的刘更生,更名为“向”,字“子政”。可见,此时的他,对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,以及对成帝朝的政治都给予了极高的厚望。但是,成帝把权力从宦官手中收回后,立即交给了外戚。表现之一就是拜其舅王凤为大将军,也就是王莽的叔父。刘向被重新启用以后,并没有进入权力中枢,以他为代表的宗室势力受到了王凤的防范。为了安抚这位三朝旧臣,成帝让刘向主持了一项亘古未有的文化工程,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全面、系统地主持校理皇家图书,其子刘歆以黄门侍郎的身份襄助。一个满腹经纶且有政治谋略的思想家,离开了政治中枢去从事文化事业,在当时来看,可能是自己人生的不幸,但却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幸!此后十八年间,刘向不遗余力地从事校书工作,直至成帝绥和元年(前8)逝世。在此期间,于成帝鸿嘉四年(前17)被擢升为中垒校尉。刘向逝世后,其子刘歆袭父职继续从事校书事业。事实上,在整理皇家图书的过程中,刘向、刘歆父子工作的对象已经远远超出了皇家图书的范围,他们对书籍本身的整理也远远超过了技术层面的归类校勘,而达到了“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”的层次。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事件,保存了大量濒于湮灭的先秦及汉代典籍,总结整理了先秦以来的文献和思想学术,努力建构了以儒家为核心,兼采百家、兼收并蓄的文化信仰和学术谱系,校书过程中为每部书编写的《叙录》,以及刘歆最终完成的《七略》,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和校雠学的开山,对后世文化发展和学术的走向,影响至巨。

《说苑》一书是汉元帝年间，刘向放废居家的时期，根据旧史料编纂、改写并增补而成，是以谏君匡政为目的有一定资治性质的历史故事集。此时的刘向，因与宦官集团的斗争失败，离开了元帝朝的权力中枢，被免为庶人。但他的品节和才智没有使他在巨大的困厄中沉沦颓唐，而是选择了著述。《说苑》当中有很多是古代的君臣故事，涉及国家的兴衰成败，他想通过这些发人深省的故事，来委婉地提醒当政者，国家已经出现了类似于前代的社会政治危机。其对社会危机的批判又符合儒家“温柔敦厚”的特点，相对隐晦，曲折委婉，循循善诱。作为汉王朝的子民和皇室的中坚，尽管被免为庶人，其苦心孤诣，可见一斑。

《说苑》的编纂与其政治活动紧密相关。班固在《汉书·楚元王传》中说：“及采传记行事，著《新序》《说苑》凡五十篇，奏之。数上疏言得失，陈法戒。书数十上，以助观览，补遗阙。上虽不能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。”可见《说苑》一书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，其与刘向给皇帝的上疏相互配合，“言得失，陈法戒”，带有强烈的时代批判的特点。目的是挽救汉王朝大厦将倾的社会危机，匡君救世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“助观览，补遗阙”的作用。每一卷都是熔铸许多故事来表达一个中心思想，或是以一个中心思想为核心，汇聚很多治国、理政、修身、全性的格言。《说苑》二十卷，每卷各有标目，相邻的标目在主题上接近。依次为：《君道》《臣术》，论述君臣之道，主张人君应当任贤纳谏，不信谗言，亲贤远佞，重教化，轻刑罚；《建本》《立节》，论君子立身之本，主张学积成圣，重视劝学；《贵德》《复恩》，论君主臣民当以德相感召，主张以民为本，爱民养民，报恩避祸；《政理》《尊贤》论王霸之政及尊贤成功之理，主张仁政、教化、修德、重贤；《正谏》《敬慎》，论进谏敬慎，存身全国之道，主张讽谏、贵生、恭敬、谨慎；《善说》《奉使》，论知言善说及行人之辞，主张实事求是，讲究修辞，灵活应对，不畏强权；《权谋》《至公》《指武》论权谋公正，慎兵备战之道，主张上不玩兵，下不废武；《谈丛》《杂言》汇集修身治国之言，主





张君子以修德为上,虽屡遭困厄但品行不移;《辨物》《修文》《反质》论辨物达性,文质相用之道,主张人情练达,事理通晓。书中多言立身处世之道与士节的培养,“积仁为灵”(《修文》),有对清明政治的向往,对宦官专权的批判,对贤才的肯定,对政治策略的推重,对奸佞的鞅挞等。《说苑》记载了很多的历史故事,多有所本,出自《韩诗外传》《孔子家语》《晏子春秋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战国策》《吕氏春秋》《史记》等等。也有一些是寓言故事,采自《庄子》等;还有一些是汉代史事,也有刘向为说理需要而自撰的故事;有些与史事有出入,是刘向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曲折反映,不可单纯以史事来看待。

刘向《说苑》所表现的思想与时代和家族密切相关。在学术倾向上,汉初是一个学术繁荣的时代,黄老道家、儒家、法家皆为显学。中央政府实行休养生息的国策,推重黄老道家思想;至武帝时期,儒家取得统治地位。但是各家思想的影响仍然非常大。刘向家族又有良好的学术传统,他从小受到家学浸润。故其一生处在政治与学术的纠结之中。从学术渊源来看,刘向受家学影响甚大。他的父亲刘德“修黄老之术”“常持老子知足之计”。他历仕宣、元、成三朝,历经学术思想的酝酿积累与政治仕途的兴衰升降。他数次下狱,而不改初衷,具备学者的沉静寡欲和骨鲠睿智,又关心政治,视国事为己责,希冀以一己之力匡时救弊。故而《说苑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刘向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的高尚的悲剧精神。

关于《说苑》的价值,早在南朝刘勰《文心雕龙·诸子》中就有中肯的评价:

……若夫陆贾《新语》,贾谊《新书》,扬雄《法言》,刘向《说苑》,王符《潜夫》,崔寔《政论》,仲长《昌言》,杜夷《幽求》,咸叙经典,或明政术,虽标论名,归乎诸子。何者?博明万事为子,适辨一理为论,彼皆蔓延杂说,故入诸子之流。夫自六国以前,去圣未远;故能越世高谈,自开户牖。两汉以后,体势漫弱,虽明乎坦途,而类多依采。此远近之渐变也。嗟夫,身与时舛,志共道申;标心于万古之上,而送怀于千载之下。金石靡矣,其声销乎?

刘勰认为《说苑》等书,“蔓延杂说,故入诸子之流”,强调其中牵涉了诸多问题,是先秦诸子之文的延续,同时,也接续了先秦诸子著书的精神,“标心于万